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 非西方发展理论

## ——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　　主编
董正华　昝　涛　郑振清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4-24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西方发展理论 /（美）威亚尔达主编；董正华，咎涛，郑振清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ISBN 7-301-10152-X

Ⅰ. 非…　Ⅱ. ①威…②董…③咎…④郑…　Ⅲ. 发展中国家 - 社会发展 - 理论研究　Ⅳ. D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3440 号

Howard J. Wiarda
Non-Wester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Regional Norms versus Global Trends
EISBN 0-15-505366-3
COPYRIGHT © 2000 Wadsworth，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Inc.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omson Learning（a divisinon of Thomson Learning Asia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出版。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by Thomson Learning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Macao SARs and Taiwan）.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by any means，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val system，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销售。未经授权的本书出口将被视为违反版权法的行为。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981-265-738-X

书　　名：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
著作责任者：〔美〕霍华德·威亚尔达 主编　董正华 咎　涛 郑振清 译
责 任 编 辑：徐少燕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10152-X/D·1359
出 发 行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 pku. edu. cn　　电子信箱：ss@pup. pku. edu. 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730mm×980mm　16 开本　12. 5 印张　192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 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作者简介

**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J. Wiarda)

**霍华德·威亚尔达是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政治学教授兼伊比利亚与拉丁美洲研究** Leonard J. Horwitz **讲座教授、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ashington)**高级客座研究员。他的主要著作有**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s in Iberia,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以及** Ethnocentrism in Foreign Policy:Can We Understand the Third World**?等。**

**彼得·穆迪**(Peter R. Moody,Jr.)

**彼得·穆迪执教于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政府与国际研究系。他著有**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和**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Post-Confucian Society **等,主编** China Documents Annual**。**

A. H. **萨姆伊**(A. H. Somjee)

A. H. **萨姆伊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 in Canada)**名誉教授。他的著作包括** Political Capacity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Parallels and Actual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Theory:Critiques and Explorations,**以及** Development Success in Asia Pacific **(与** G. **萨姆伊合著)等。**

**拉纳·怀利**(Lana Wylie)

拉纳·怀利是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政治学专业博士候选人、Leonard J. Horwitz 奖金获得者、国际发展项目研究成员。她发表过多篇关于政治发展的文章。

安瓦尔·赛义德（Anwar H. Syed）

安瓦尔·赛义德是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政治学教授。他著有 Pakistan：Islam，Politics and National Solidarity，并写了大量关于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美国政治、比较政治的论文。

戴尔·赫什伯林（Dale R. Herspring）

戴尔·赫什伯林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后任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著作包括 The Soviet High Command，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Systems，以及 Russia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斯蒂文·布瓦拉尔（Steve D. Boilard）

斯蒂文·布瓦拉尔是西肯塔基大学（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政府学副教授，著有 Reinterpreting Russia，Russia a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及 New Horiz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等。

# 译丛总序

宁　骚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当这种方法被系统地用来认识政治现象时，就形成了政治的比较研究；当比较的对象是各自独立的政治体系时，这种政治的比较研究就成为比较政治学。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政治学，而他获取和分析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就是比较，这样他就同时创建了比较政治学。自19世纪中期起，经验研究和比较分析推动着政治学从思辨的哲学变成实证的科学。到19世纪末，政治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比较政治学则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比较政治学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比较方法必须贯穿该学科领域的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中。这一方法要求在同一研究中观察和分析的对象须是不少于两个并互为参照系的个体或群体，比较的直接目的是辨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比较始于对事物外部特征的描述，进而对其异同做出分析和解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是要使比较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比较分析必须选择和使用一定的理论工具。因此，比较的方法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纳其他理论方法和技术方法的一种方法。第二，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至少应当是独立的政治体系，所以现时代的比较政治学可以简括地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研究才属于比较政治学，明确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除此之外就难以划定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但是，以民族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把国家和政府作为直接观察的对象。事实上，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国家的总体框架与情景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单位，无论群体、组织还是个人，尽收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第三，比较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经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或经验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和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或另一核心要素。对比较政治学来说,真理是具体的。一切既有的概念、命题、模型和理论的真理性,都有待于经验和事实的进一步验证,都以各个事物发生与沿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换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有一条主线,这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才能更有效地使政治的跨国比较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比较政治学的这种科学诉求或科学化努力,迄今已经经历一系列重大的范式变迁。在 19 世纪,历史主义是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这一名言成了比较政治学者的共同信条。人们把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比较"的方法。进入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前半期,制度主义成为这门学科的主流范式。人们相信,在宪政民主制已经巩固的条件下,由现行法律体系确立的一系列正式制度规范,制约和决定着各种政治主体的实践活动;而现行法律体系是人们在关于国家与法的政治理念指导下构建起来的。政治哲学—法律体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跨国分析的典范思路。因此,这种制度研究法又被叫做法律—制度主义。同时,这一主流范式并不排斥或贬抑历史主义;相反,在获取和处理实证材料的基本方式上,以及在对制度变迁和制度规范作用于政治实践的过程与结果的研究上,它必须借助于历史主义。20 世纪 50—60 年代,行为主义取代法律—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行为主义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引进的一种方法论,它与刚刚兴起的电子计算机和社会统计学的应用相结合,使比较政治学在获取和处理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革,不仅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门学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全球的范围,而且使这门学科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此,比较政治学不再仅仅是静态、描述的,而是动态、解释性和预测性的,理论的建构与验证成为研究的动力和目标。60 年代末,比较政治学开始转入后行为主义时期。后行为主义不是一种研究范式,而是多种范式的并立和竞争,影响较大的先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范式,接着是组合主义或法团主义范式,现在是新制度主义范式。

新制度主义被区分为三种既有联系而又有显著区别的分析路径:理性选

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个演绎的逻辑体系，社会学制度主义不能清晰地区分文化与制度，因此只有历史制度主义对比较政治学这门经验科学来说，才具有广阔的适用前景。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关系。它把制度看作是一定的历史情景的产物，而制度塑造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并且影响着行为者的整个行动过程及其对工具性行为的选择。它认为个体是深深地嵌入制度网络之中的，个体偏离制度会使其境况变得更坏 制度对于解决集体行为困境的贡献越大，它就会越有活力。它将焦点集中在展示一定的政治现实中多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作用，通过将结构化要素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揭示制度是如何构建这些互动关系并藉以影响政治结果的。历史制度主义提供的新视角，可使比较政治学更加有效地去解释当今世界各国内部政策的延续性和不同国家间政策的变异性。

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关系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解释的困境，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指明了走出困境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历史研究法是一切实证科学的唯一方法，这种观察方法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现实生活发展过程中的人。他们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对一定的个人进行的经验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1 页）。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同时明确地认识到影响这个过程的还有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也认识到各个人都有其自己的、方向各异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并对外部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就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导致了一定的历史情景的形成。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揭示出了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的更深层次的动因，从而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更有解释力的一种方法论。

比较政治学的每一种主流范式都有众多的学者遵循，并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归类，我们可以把比较政治学划分成这样几种基本的研究领域：（一）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辨识不同

民族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异同并解释导致异同的原因，用统一的概念体系来认识和表述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进而抽象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在经验层面可证伪，从而确定其解释力的强弱和范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积累是极其丰富的。自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起直到现在，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多出现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对比较政治学来说，任何既有的理论的真理性都有待于新的事实和经验的检验，因此被积累起来的理论成为新的研究项目的理论假设的来源和分析框架，从而具有方法的功能。由此可见，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统一的。（二）比较政治制度。在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以前，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政府或比较政治制度。自比较政治学诞生以来，政治体制始终是这门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政治体制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统治者和管理者的行为准则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构成的整体。政治制度凝聚了所有种类的权力，约束着体制内外各种人的行为。观察和比较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制度，是认识和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最方便视角。因此，尽管曾受到行为主义范式的有力冲击，比较政治制度仍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领域被保留了下来。（三）比较政治行为。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可区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两类。比较政治制度只观察和比较制度性行为，非制度性行为不在其视野之内；而比较政治行为则对二者都进行研究，并注重观察和比较非制度行为——既包括体制内各种政治角色的非制度行为，如腐败、贿选、幕后交易、营造和维护非制度性社会关系网络等，也包括体制外各种政治角色，如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大众传媒、辅助决策机构（智囊团）、企业界和学术界精英以及宗教、族群、社会阶级与阶层等的政治行为。对比较政治学来说，比较政治行为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研究视野，增强了它的理论构建能力，推动着它生发出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民族政治学等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从而使之真正地担负起了政治学科学化的重任。（四）国别政治与地区政治。比较政治分析是建立在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系统的、深入的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分析就失去了实证的基础。

比较政治学到现在已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这门学科的所有主流范式都得到了引进并被应用于研究工作中，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我国的比较政治学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法律—制度主义从这门学科被引进时开始，长期处于主流范式的地位，至今仍在政府颁布的高等院校专业分类目录中有显著的体现。第二，没有经历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的阶段，科学化不曾成为这门学科的强烈诉求：获取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始终是汇集既有文献记录而不是社会调查，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极其罕见。第三，在从事比较政治分析的学者中，很少有人做过或同时在做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的研究；而在从事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研究的学者中，也很少有人真正地关注比较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尚未能够正确地处理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向世界，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观照自己的国家，比较政治学将适应这一需要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为推动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有选择地评介国外的学术成果是十分必要而且必需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体察到这一情势，筹划、组译并将出版《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这套丛书收入的著作侧重于可以辅助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甚至直接可用作教材的作品，具有入门引导性质，但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能够相当系统、全面地勾勒和凸显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对象、议题和方法，介绍和反映在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构建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我相信，这套丛书会使有志于学习和研究比较政治学的读者受益良多。

2004 年 4 月 12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前　言 …… （Ⅰ）

第一章　绪论：西方传统及其向非西方世界的输出
…… 霍华德·威亚尔达（1）
第二章　东亚：儒家传统与现代化 …… 彼得·穆迪（19）
第三章　印度：对西方发展理论的挑战…… A. H. 萨姆伊（40）
第四章　拉丁美洲对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的探索
…… 霍华德·威亚尔达（58）
第五章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西方的影响与本土的现实
…… 拉纳·怀利（80）
第六章　伊斯兰发展模式 …… 安瓦尔·赛义德（96）
第七章　东欧及其对民主政治文化的探索 …… 戴尔·赫什伯林（114）
第八章　俄罗斯与中亚 …… 斯蒂文·布瓦拉尔（130）
第九章　结语：地区层面与全球维度的发展…… 霍华德·威亚尔达（146）

建议阅读书目 …… （160）
索引 …… （167）

# 前　言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认为非西方或第三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主要是追随和模仿西方。无论马克思的模式还是非马克思的模式，都将西方或发达国家视为样板；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展示了后者未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景象。

迨至 70 年代，关于本土或内生发展模式的思想占领了第三世界各地。非西方国家被如下想法吸引：以本身既有的和最近重新发现的价值与制度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系统，而不是盲目地、缓慢地模仿西方。这当中有东亚或儒家发展模式、南亚发展模式、伊斯兰发展模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模式，可能还有拉丁美洲发展模式。拉丁美洲是一个特别难以处理的案例，虽然它基本上是西方式的，同时带有半封建的残留，这些残留可以追溯到 1500 年以前的西方传统。

今天，形势更复杂更混乱，因此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并不断更新。一方面，一些群体和个人（例如伊朗的宗教领袖们、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坦桑尼亚的尼雷尔等）继续坚持认为非西方发展理论有优势；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开始对本土理论和制度失望，认为其浪漫、不现实、难以操作，只是知识分子思想的产物，与本国人民的愿望和实践不符。最近，由于西方对非西方世界巨大的、也许是不可抵抗的影响（可口可乐、牛仔裤、摇滚乐、消费主义，以及并非无关紧要的民主、人 vii
权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后者在争论中已经居于有利地位。此外，冷战的结束不仅意味着西化的主要替代物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解体和失去信誉，也使第三世界不能再取利于美国和苏联之间，以在较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自主与独立。

所有这些变化，包括各种新潮流和反潮流，迫使我们在这一新的国家与国际语境下重新评价地方的或区域的发展模式与全球的或普遍性的发展模式之间的争论。在今天的形势下，本土模式和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希望继续存在？它们能不被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经称之为“世界文化”的西方价值与观念所压倒吗？或者反过来问，冷战的结束难道不可能给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俄罗斯和东欧的土生族裔、宗教和民族群体提供广泛的机会，使之得以更强硬地维护他们自己的决定、民族自尊以及分离主义观念，而并非仅仅引向一种模式？我们能否不要看到这样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连续系列：一端是具有强大本土文化、能够有选择地借用西方传统的国家，如日本、印度和中国；另一端则是那些只有弱小的本土文化、很可能被西方影响压倒甚至吞没的国家？

本书想要尽力回答的问题是：现在只有一种（大体上即西方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还是仍然有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另两种（重商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或者更多种（伊斯兰的、儒家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等等）发展模式的存身之地？西方与非西方模式有什么样的混合与重叠？伴随冷战的终结和新自由主义模式表面上的胜利，还有希望看到通往发展的多条道路吗？还是说现在只剩下一条道路可走？本土群体只能像那些墨西哥或危地马拉人那样放弃斗争并顺从地被纳入西方道路，还是仍然有希望保存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本书的主题涉及大量重要问题，无论就我们对用来解释非西方国家的模式的思考来说，还是就第三世界国家未来发展和它们的本土运动来看，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和政治上都会得到回应。在俄罗斯、中国和日本，西方与非西方模式之间的争论还涉及有关安全的诸多重要问题。

本书通过审视世界上所有主要的非西方地区或部分属于西方的地区来考
viii 察这些问题。各章作者都是其研究领域里公认的权威。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回答一些共同的问题：

该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是西方的，或者非西方的？本土有哪些固有的发展传统，它们的影响如何？西方与非西方的混合情况如何？冷战终结以及新近的新自由主义信条有哪些影响？西方的与本土的变迁模式各有什么样的前景？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融合？各章通用一个提纲有利于比较。由主编加入一

个绪论和结语，有助于联结全书各部分，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而不是一本松散的文集。

本书主编对作为他现在的“家”的研究机构表示感谢，感谢它们对本书和其他课题连续不断的支持。它们是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政治学系和设在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哈考特布雷斯学院（Harcourt Brace college）出版社的外联编辑大卫·塔托姆（David Tatom）不仅鼓励写出本书，还对“比较政治学的新视界”丛书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使之得以连续不断地出版。本书即该丛书中的一本。芭芭拉·西司拉克（Barbara Ciesluk）帮助打字，并对本书的编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遵循惯例，后面的分析文字只能由作者和主编负责。

霍华德·威亚尔达

1997 年春于华盛顿特区 ix

（董正华译）

# 第一章

# 绪论：西方传统及其向非西方世界的输出

霍华德·威亚尔达

20 世纪 60 年代，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和经济发展研究等领域基本上被后来所谓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所主导。发展主义又来自早先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以及政治学的强力推动和变迁过程的分析。发展主义涵盖了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一批由前殖民地独立而来的新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与此同时，美国对外政策日益热衷于建立一种有吸引力的非共产主义发展模式，用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发展研究。[①] 到了 60 年代，对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甚至心理发展的研究都成了社会科学的主导范式。

这种发展模式认为，所有社会都会通过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是大体相似的途径实行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现代化，最后一个概念总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通常意指更高程度 1
的多元化、民主和社会公正。经济发展的巨大发动机一旦启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兴起、农民的动员等可预见的社会

变化随即产生。这样一些社会转型进而导致更高程度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政治,以及对更有效的公共政策的需要。[②]

整个过程通常被用像这样美好的、洁净的语式描绘,结局当然是幸福的。其间与重大变革相伴随的痛苦、往往带有血腥的破坏和混乱,则被忽略了。此外,这种发展观还告诉人们,让人憎恶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过渡期间的病症",可以通过发展克服或战胜;这一单线的、可预测的普世性发展进程的最后产品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令人愉快的民主、多元化和公正的社会。无论对主张发展主义的学者还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而言,这一结论都显得那么适意!不幸的是,它对发展的描绘和对步入发展进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描绘都是不准确的。

随之而来的是越南战争,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连遭暗杀,遍及美国城市和大学的动乱,以及水门事件。这些变故动摇了我们对美国模式的必然性和期望值的信念,而发展范式中的许多东西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此外,之前写了许多发展文献的理论家,原来从未到过第三世界。还有,在历经第三世界国家十年的发展和对它的研究之后,决策者和理论家认识到,基本的发展机制和进程常常与西方模式不符。结果是 70 年代对流行的发展模式的强烈批评和另寻途径(依附论、统合主义、官僚—国家主义),以及对第三世界不愿意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美国和欧洲)发展经验的初步认识。[③]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并随即兴盛起来的另类方案之一,是关于第三世界内生或本土发展模式的概念。在经受了发展主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历了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压迫性的、践踏人权的政体纷纷掌权的风潮以后,内生或本土发展理论有巨大的吸引力。可以想象,与舶来的、经常不合时宜的西方模式相比,这种内生模式将会更切近当地的情况。因此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东亚的或许是儒家的发展理论,印度的、可能是印度教的发展理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理论,拉丁美洲的发展理论,以及独特的伊斯兰发展理论(尤其在伊朗 1979 年革命以后是如此)。发展进程中可能仍有普遍性的东西,但是现在第三世界每个地区都将——借用弗兰克·西纳特拉的一首歌的名字——"自行其是"(my way)。[④]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内生发展理论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已经非常流行。它不仅提供了一项替代在他们那里常常发生功能障碍的西方模式的方

案，还指出了介于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以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不幸的是，极力接受本土发展理论的国家（伊朗、坦桑尼亚、柬埔寨）的情况并不乐观。此外，本土发展理论还有其他严重问题，对此本书将予以详细讨论。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些本土、内生观念和发展模式被证明（东亚或许例外）并不能比先前的理论更有效地推动实际的发展，而且常常直接造成危害。

随后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个新的国际世界出现，先前四十五年的每一项基本的外交政策设想都需要重新检讨。国际政治中的这一转型正好发生在这样的时候：20 世纪 80—90 年代，“第三波”[5]民主似乎在全世界凯旋并显示了未来的趋势[6]，而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需要对其成为新正统的认可，曾经被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白鲁恂称为“世界文化”的消费主义（可口可乐、牛仔服、摇滚乐，以及并非无关紧要的民主与人权）似乎也正要风靡全球。

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下，本土发展理论的情况如何？它们还有活力和吸引力，抑或已经被西方的影响所压倒？有没有可能达成调和或者有所选择，保留好的、有用的且又能顺应西方道路的本土实践？第三世界及其制度是否注定要被西方强大的攻势淹没？会不会有一些重要而强大的国家（例如日本）能够成功地调和西方和本土道路，有选择地吸取两者中的最优成分，而另一些不富裕又缺少自信的国家则完全被西方文化打倒？什么样的融合可能发生？所有这些趋势对于社会科学——无论是我们的发展理论还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意味着什么？ 3

这些重大而迷人的问题，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

## 比较政治学与发展文献

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比较政治学研究为后来被称为“形式—法律”（formal-legal）方法所主导。学者专注于比较政治体系的较规范、较接近法律条文的层面：宪法、法律、联邦主义、地方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议会的权力和法庭的权力，统治者和官僚制度。比较政治学基本限于这些主题，而且研究仅限于少数国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欧洲西北部的英国、法国、德国。由于这

些原因，该领域被批评为狭窄、种族中心、研究者目光狭隘、令人厌烦。[7]

但后来发生的四大转变使比较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科的首要领域。其中两个转变是学术和思想方面的，另外两个是发生在实际政治中或曰“实地层面”上。学术方面的第一个转变发生在较广泛的政治科学领域：趋向于更重视政治的动因和非规范层面——政党、利益群体、舆论、政治过程、政治行为、决策。第二个转变发生于比较政治学本身：走出形式—法律方法和欧洲中心主义，走向政治过程研究，重视分析而不再仅限于描述，重视实实在在的比较而不是对个别国家的个案研究，聚焦于原先不研究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第三世界。

实地层面上，比较政治学领域重新成为学科焦点，意义更为重大。第一个重大变化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非洲、亚洲和中东的一大批新独立国家突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短短几年内，可以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活的实验室”的国家的数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从未被认真研究过的新国家得到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是令人兴奋的事，吸引了一批最优秀的青年学者去研究这些发展中国家。十年间，研究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人数超过了仍留在传统的欧洲研究领域的学者。最令人振奋的是，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创新性理论方法将在发展中地区的研究中形成。



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伴随新国家的革命而发生。冷战初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焦点是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欧洲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而最受关注。但是，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考虑到埃及、伊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刚果（后来的扎伊尔）和古巴（这时发生了卡斯特罗革命）等重要国家的情况，美国开始认识到，冷战的主要阵地可能是第三世界，那里有着游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美国和苏联常常利用当地武装进行代理人战争的。此外，美国政府很快认识到，它对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几乎一无所知，它也没有给发展中国家提出一个有吸引力的、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模式。[8]因此，美国政府这时开始近乎狂热地在顶尖的美国大学创立或资助设立新的研究第三世界问题的国际中心，给年轻学者提供资助鼓励他们从事第三世界研究，并开始探讨能使第三世界上层感兴趣的、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模式。

去哪里找这样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模式呢？几乎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选择。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鲜有仔细研究过第三世界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